

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春风

发布时间:2013-04-15 09:24 作者:春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31543 次

今年初,《共识网》上很热闹。

有人批判马克思,例如,1月18日,张二江写的《自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1月30日,钊哲写的《马克思主义百多年的检验历史和结论》。也有人设法为马克思开脱,例如,3月8日,林深靖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毛泽东主义》。侯工最有意思,他要为马克思理论正名。他肯定马克思学说的精华,认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歪曲、掺假和背叛了马克思学说,走上了邪路。

我们从没有肯定过马克思

1949年以后,由于“一边倒”的错误政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渴望增长知识的年轻人来说,看到的国外的书、电影,听到的国外歌曲大都是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书、电影以及歌曲几乎都被屏蔽了。到了文革期间,除了毛泽东的书,有限的马恩列斯的书以外,那时候阅读苏联的书已经成为阅读封资修反动书籍的严重问题。现在《山楂树》这首歌似乎又流行起来了。文革期间,我在院子里轻轻地用手风琴拉唱《山楂树》,一位路过的工宣队员,走进院子,严厉斥责我拉唱苏联修正主义的反动歌曲。我笑了,有点怜悯地看着他。这人忽然低声对我说,这种曲子只能偷偷地在屋里拉,我是为你好。我说了一声谢谢,他转身走了。

世界对那时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扭曲的。从这一点上,我理解并原谅无知的“红卫兵”跟随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下的罪错。在这里我声明,本人不是红卫兵。

1968年,我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极度厌恶,决定系统学习,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学习计划。很难找到其他可以读的书,我只好读马恩列斯毛的书。我不仅背过了那本红小书,还背过了“矛盾论”、“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我不仅阅读了马恩选集两卷,列宁选集两卷,还读过了斯大林的13卷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时只借到第一卷)我读的时间最长也最认真。不过,我对《资本论》这本书印象极坏。马克思这个人气量极小,总是喋喋不休地讽刺他人是庸俗的经济学家,整本书重复连篇,又臭又长。远没有我阅读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74年出版)那么舒服,尽管多年后才理解了“看不见的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书解禁了,国外的新书也逐渐越来越多地引进了,我们可以读的书多了。同时,笔者及其朋友们放弃了历史研究,进入了经济领域。新的视野使我们很快看出了马克思的理论破绽。198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王安是不是资本家兼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时候这样的文章是得不到发表机会的),批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逻辑错误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当时有不少经济工作者都在批判马克思。我有几份那时召开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研讨会”内部出版的专刊,刊登了很多批判马克思的文章。

1983年,影响了国内一部分年轻人的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出版了。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书。说实话,经历了文革,所目睹的丑恶现象和种种罪行,使我对中国极端失望。读了托夫勒的书后,我看到了阳光。此后,我开始学习信息技术,逐步进入了信息经济学领域。

1986年秋,我从经济管理视角剖析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问题与危害,刘宾雁老师听后,沉默一会儿,将桌子上一摞书的最下面一本抽出,那一摞书倒下了。刘宾雁老师对我说,你摧毁了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他沉思了一

会儿又说：难道我们这一代人都错了吗？我说，不是你们这“一代人”都错了，而是你们“这一帮人”都错了。你们这一代人中有许多拒绝马克思的人。刘宾雁老师送给我一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书，建议我看一看。我对他说，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剩余价值和暴力”，用剩余价值来推断资本家的剥削，用暴力来消灭私有制，给人类带来了血腥灾难。马克思是人类进步的破坏者，是嗜血者。今日，有人依然坚持“剩余价值”观点，那是无知；依然坚持暴力手段，那就是无耻。如果放弃了“剩余价值和暴力”，那就不是马克思跟随者了。我希望人类历史能够尽快地翻过马克思带来的这血腥的一页（5年后的1991年，前苏联翻过了这一页），我从此不再谈论有关马克思的话题（在《小心，秋风》一文中，曾经几笔带过），进入新的学术领域，研究新的社会形态。

我和朋友们曾经读过秦晖写的《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秦晖认为：“古今中外，许多宗教以其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赢得了无数信众，而牛顿、达尔文的科学又以其缜密的理性思维倾倒了无数智者。但同时具有宗教般的道义权威与科学般的理性权威双重魅力的，除马克思主义再无其二。”（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秦晖依然如此高调地吹捧马克思主义，我们非常吃惊。有的朋友说，秦晖如此吹捧马克思主义，是无知？还是献媚？朋友们曾建议我写文驳斥，我拒绝了。我不愿再为翻过去的垃圾浪费精力。近日，侯工连发多文，为马克思辩护，朋友们竭力劝说我阐明观点，我答应了。不过，我认为，就学识和影响力来说，侯工尚无法与秦晖比拟，我还是与秦晖讨论吧，他们二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同时我声明，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谈论马克思及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我实在不愿再为这个人类破坏者浪费时间了。

本文第一、二节就《自由、乌托邦与强制》一文中秦晖表达的观点，谈谈我的看法。

一、“道义”与“理性”的扭曲

秦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宗教般的道义权威与科学般的理性权威双重魅力，这是对道义和理性的扭曲。

暴力与无耻

如果克列蒙梭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头脑就有问题。”

可见在克列蒙梭心目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是具有良知的。

社会主义者有很多派别，是否所有社会主义派别都具有良知？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其人具有良知吗？

简单地做一下对比就能分晓。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虽然出身贵族，却同情劳动群众。他看到“劳动力的价格十分低廉”，“穷人没有工作”，为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采取了否定态度。他设计了一种新制度叫做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由实业者和学者掌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权力；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人们应当把自己的社会尽量组织得有益于大多数人，以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作为自己的一切劳动和活动的目的。”同情下层民众，主张改善人数最多的人群的生活，圣西门具有良知。

夏尔·傅立叶虽然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但是坚决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傅立叶设计了一种叫做“法朗吉”的社会基层组织。他不主张废除私有制，“法朗吉”是招股建设的。在“法朗吉”内，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傅立叶希望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他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无疑，傅里叶是具有良知的。

罗伯特·欧文是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语言、宗教、修养、习惯、意识形态和行为性质”。因此，欧文积极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在工厂里，他通过改善工厂设备的摆设和搞好清洁卫生等方法，为工人创造出一个尽可能舒适的工作场所。在新拉纳克厂区，欧文建立工人宿舍，在住宅的周围，种植树木花草。他主动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 13~14 小时缩短到 10.5 小时。欧文提高工人工资，工厂暂时停止，工资照付。他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为了使工人的闲暇时间有正当向上的娱乐和学习，欧文还专门为工人建造了晚间文娱中心。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积极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欧文是具有良知的。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例子，证明他们是有良知的，是人类道义的楷模。

马克思具有良知吗？是道义的权威吗？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自己主张的社会主义同 19 世纪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把其他社会主义一律归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唯有自己独对，其他的社会主义都错，并扣上反动、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大帽子，这是马克思良知的表现？

那么，马克思自我标榜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一种什么货色呢？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

在这个宣言中，马克思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嚣张的公开鼓吹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强盗宣言。

马克思对社会的批判和设想，并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实践的证明，这厮便肆无忌惮地鼓动用暴力推行他的主张，剥夺他人的资产，这是一种疯狂的暴徒行为。

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就是用暴力夺取他人的资产。在克列蒙梭心目中，暴徒马克思具有良知吗？

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的第一节“良知”与“头脑”双重困惑中，秦晖没有将非暴力的社会主义与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为马克思主义漂白？

社会主义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是一种道义的探索，而在马克思这里就是一种暴力犯罪！

是谁玷污了具有道义的社会主义，始作俑者正是马克思！其追随者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

在秦晖心目中暴力的马克思主义是道义权威，这就是秦晖的真实底线？

美国动物学家康罗·洛仑兹认为“所有强大的食肉者都具有足够信赖的禁忌，以防止自我残杀”。“许多社会动物里的禁忌控制了攻击行为，防止它们伤害或杀死自己的同类。”“这是动物行为机能在功能上类似道德的功能。”（洛仑兹《攻击与人性》）

族内杀戮禁忌是元初的道德原则。

人类以往的攻击行为多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族内攻击多发生在民众与官府之间。马克思的暴力主张引发了世界各民族内部的全面的暴力攻击行为，挑起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族内残杀。

德国心理学家 E·弗洛姆告诉我们，“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第一种，是人与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侵犯性，这是当他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攻击（或逃走）冲动，这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冲动。这是一种防卫性的‘良性的’侵犯，是个体和种族的生存所必须的，它是生存适应性的，而一旦威胁消逝，它也跟着消失。第二种‘恶性侵犯’，即破坏与残忍。这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大多数别的哺乳动物都没有；这不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也不是生存适应性的；它无目的可言，除了满足凶残的欲望之外，别无意义。”（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

虽然“恶性侵犯”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恶行。主张用暴力剥夺他人资产的马克思是典型的恶性侵犯者。他播下了跳蚤，收获了臭虫，看看那些前苏联以及今日中国一批批的吸血虫吧！

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

了解一下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成了一个恶性侵犯者。

麦克莱伦在其著作《马克思传》中描述了马克思的贫穷生活：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

1852 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 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

4 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 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蕙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 9 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

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

1852年，马克思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时，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1852年马克思已经34岁，正当壮年，却不能承担起养活一个家庭的责任。

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肉铺老板乃小本生意人，挣一点小钱养家糊口。马克思欠着他们的账，却不想还钱。“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他们进行恶意攻击：“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贫穷到了如此地步，借了别人钱，还骂别人是庸人。难怪与拉萨尔反目！

这就是马克思！

一个连自己的家庭都养活不了的无能之辈，没有反思自己的责任，没有感觉到男人的耻辱，反而将怨恨转向了社会，于是他把灵魂预售给了魔鬼，成了一个恶性侵犯者。用暴力夺取他人的资产就成了这个人类破坏者的梦想，梦想着用暴力夺取他人的财产之后，他就不再贫穷了！

在《自由、乌托邦与强制》的“乌托邦与强制”一节中，秦晖认为：“‘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了。--因而借‘理想’以营私者太多了。”

秦晖既然意识到可怕的是强制，为什么还吹捧用暴力强制手段来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宗教般的道义权威”？

给强盗的头上戴上一顶的道义权威的帽子，这就不仅仅是扭曲道义了！

你在想什么，秦晖？

马克思、恩格斯改邪归正了吗？

有人利用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转述的马克思话语：“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

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说明马克思改邪归正了。这种人故意删去其后的话语：“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直至 1893 年，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依然坚持“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

恩格斯依然坚持用暴力埋葬资产阶级。

不要玷污积极自由

我的朋友们最不能原谅的秦晖是他玷污“积极自由”。

秦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并非没有历史成果。如果说当今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福利是自由秩序下劳务与资本的供求关系所致而非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那末自由秩序本身则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社会主义为其逻辑延伸）两种价值的共同结果。尽管今日像哈耶克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抨击‘积极自由’，但在自由秩序的建立时期这两种自由观实际上是表面互悖而实质互补的：‘积极自由’功在破旧，它赋予人们冲破专制樊篱的理念动力，而‘消极自由’则功在维新，它教会人们认识事情的限度，防止以暴易暴。作为社会主义理论里程碑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积极自由’理念的集大成者”（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秦晖竟然把马克思主义的强盗理念说成是积极自由！？

非暴力的社会主义是有历史成果的，因为它提出一种理想并鼓励民众为之奋斗，具有一种积极自由的精神。

我最为欣赏的是欧文，他是社会主义者中“积极自由”精神的杰出人物。

1812 年，欧文为宣传自己的工厂改革成就，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引起欧洲社会的广泛关注。

1815 年，欧文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一书中，呼吁制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议会法案。经过不断努力，议会终于在 1819 年第一次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日的法案。

1817 年，欧文在《致工业和劳动贫民救济协会委员会报告》中提出建立合作社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

1824 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 1214 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试验，虽然实验以失败告终。但仍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积极的实验。

人们有权利积极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要用合理的正确的方法去争取，而不是用暴力去强制。

欧文的社会主义是在积极地争取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破坏自由。

剥夺他人资产的暴力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死敌！不要将争取自由的暴力与剥夺他人资产的暴力混为一同。

马克思本人把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斥为反动、保守、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为后继者斯大林、毛泽东疯狂镇压不同政见者提供了先例和依据。毛泽东发明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残酷迫害了那些真正争取自由民主的积极自由的右派们！

秦晖认为暴力马克思主义是“积极自由”理念的集大成者，这是在美化掠夺他人资产的暴徒，玷污积极自由理念！

暴力与自由

秦晖欣赏“《宣言》中的那句凝聚着马克思理想的名言：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怎样使每个人自由发展？

就在同一《宣言》中，马克思叫嚣着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赖以生存的财产都没有了，每个人何以自由！前苏联及毛氏中国时期，党国垄断了所有的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迫使民众沦入了对党国彻底的人身依附，自由何在！

忘记了崔健那凄凉的《一无所有》的歌声了吗？

《宣言》蛮横地宣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把人的独立性、个性和自由统统说成是资本的属性，进而要消灭之，每个人何以自由？马克思反对言论检查，是因为他自己受到侵害。马克思之辈掌握了政权，既然能够暴力剥夺他人的财产，也就能暴力剥夺他人的言论等一切自由。前苏联及今日中国，党国控制了报刊、杂志、电视台、电台、网络等言论渠道，就是实证！

《宣言》霸道地宣称：“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

由于人的需求不同，因此人们需要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由于人的能力不同，人们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买卖能够发挥人的不同的能力，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买卖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交互活动。无知狂妄的马克思竟然要消灭买卖，消灭了买卖也就消灭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互活动，自由何在！

迷惑于马克思“自由”的词汇，看不见马克思满口的“消灭私有制，消灭个性，消灭买卖”，分辨不出马克思的“消灭”，实质上是在毁灭自由。

何以如此，秦晖！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具有‘积极自由’色彩，它在推动由中世纪状态向自由秩序演进的过程中与消极自由主义可以互补。但在自由秩序建立后又怎样呢？谁都知道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种联合体。”（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财产能够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吗，前苏联和毛氏中国时期，存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在英国和美国，股份制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这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政党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这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人的联合。自由人联合体早已经存在！

当然这不是马克思想要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制不过是他所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点。

秦晖，你要什么样的自由人联合体呢？

无知与灾难

“布哈林曾回忆说，他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崇高和美好’，不如说首先是马克思著作‘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征服了他。维特伯爵，这个沙俄总理大臣，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贵族，一个过了 30 岁而头脑绝无问题的精明改革家，也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思以‘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使他确信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只是他认为俄国目前还太落后，所以还需要沙皇陛下的治理……”。（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秦晖用布哈林和维特伯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其实我也可以找出很多人物来印证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

本文不想那么麻烦，就以布哈林和维特伯爵为例来反驳秦晖。

我们先来看布哈林。

布哈林生于 1888 年 10 月 9 日。在中学阶段，布哈林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最初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较多，很快就转向马克思主义。1906 年，年仅 18 岁的布哈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心智未开，自身尚不具备“逻辑严整性”，就能够识别马克思著作“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吗？其实是由于无知，看看他与普列汉诺夫合作完成的《共产主义 ABC》就可以知道成年后的布哈林依然是个无知之徒。因此，布哈林被另一个无知（下面将证明）的马克思所吸引，毫不奇怪。

不仅布哈林是这样，他们那一帮人都是这样的无知之徒。

列宁生于 1870 年。1888 年，18 岁的列宁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任何企业经济管理经验的列宁被这部臆造的“巨著”所吸引。1892 年，列宁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又一个暴徒出现了。

斯大林生于 1879 年，仅仅受过中学教育。1898 年，19 岁的斯大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季诺维也夫生于 1883，从小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01 年，18 岁的季诺维也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加米涅夫生于 1883 年，曾经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01 年，18 岁的加米涅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了职业暴徒生涯。

就是这样一批无知无畏未满二十岁的青年人极其自然地就被马克思的暴力学说所征服。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黑暗中摸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如此吹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我们就再来看看维特伯爵称赞的马克思是如何“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剩余价值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阐述了他的所谓的发现-剩余价值。在第一篇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第二篇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马克思在第三篇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后是其余四篇。其中，第二篇第三节“劳动力的买与卖”，第三篇的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是马克思阐述其发现剩余价值的重要章节。以下笔者将较为详细地引用马克思在以上章节中的话语，与读过尤其是那些没有读过《资本论》的读者一起来解析马克思是如何“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剩余价值的。（笔者之所以不从第一篇谈起，是因为已经不少人批判了马克思的所谓的“商品及劳动的双重性”。由于臆想，马克思挖了个双重性陷阱，自己掉了进去，后面的跟随者以及批判者都随着马克思一起掉进了陷阱。）

在“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思说：“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生产时间和出售时间，没有其他的时间了吗？商品生产是怎样开始的？

在商品生产之前，首先需要有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时间：商品市场容量信息收集和分析、竞争对手信息收集和分析，投资收益和风险分析等；其后是商品立项决策时间：投资规模、股份构成、投资收益等；再后是组织设计以及筹备时间：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此后才进入生产时间。无知的马克思只看到了生产和销售，看不见信息收集和决策，不知道生产的起点，因此，马克思在第五章中是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的。马克思的论证，其一，逻辑起点错了；其二，只拿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这样的论证有可能精确？就是如此荒谬之极的论证，布哈林认为是“异乎寻常的逻辑严整性”，维特伯爵赞美为“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

秦晖，你也这样认为吗？

在“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思又说：“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吗？工人有自己的资产-劳动力。

劳动力即劳动能力是人类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人类自身的最重要的资产。

无论过去和现在，无论外国和中国，都有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积累了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经验成为资本家即现在的企业家的案例。

对于货币所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家，要经营企业，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设计能力、销售能力、计划能力，质量保证能力以及生产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劳动能力。资本家本人必须具备的是抗风险能力、

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在他创立企业之时，必须在企业中建立设计能力、销售能力、计划能力，质量保证能力以及生产能力的结构。

无知的马克思没有把劳动力当作资产，尤为严重的是看不见资本家的劳动力，因此第五章中，他认为只是工人的劳动力创造了商品价值。只看到资本，看不到资本家的劳动力，因而看不见价值创造的重要要素，能够说是“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吗？

秦晖，你怎么看？

在“劳动力的买与卖”一节中，马克思又说：“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就像旅馆里没有租出去的房间对旅馆老板毫无用处一样。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地发现：‘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

知道否？同样，商品不卖出去，对资本家就毫无用处，他的商品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地发现：“商品……不卖出去，就等于零。”

马克思只看见工人失业，看不见资本家破产，能够做到“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

马克思在附注50提到：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37页）

商品卖不出去，企业破产，资本家有可能跳楼，而工人除了付出劳动力没有经营风险这是事实。是施托尔希狡猾，还是马克思眼瞎？

近十几年来，我经常与工人的进行以下的对话：

对话一：

—你认为，你们的老板是否剥削你？ —老板都剥削。

—没有老板行不行？ —不行，谁领导工人干活。

—可是老板剥削你呀，你怎么办？ —我要是认为剥削得过了，就换一家工厂。

—怎么判断老板剥削过了？ —不好说，凭感觉吧。

—你想不想当老板？ —想过。不过没有钱。

—有钱，你就当老板吗？ —不一定。当老板风险太大，很多老板都破产了。

当工人干活挣钱，没风险。

对话二：

—你认为，你们的老板是否剥削你？ —我们老板还可以，工资挺高，奖金也不少。

—没有老板行不行？ —不行，任何企业都必须有老板。

—如果老板剥削你呢？ —我要是认为剥削得过了，就换一家工厂。

—怎么判断老板剥削过了？ —做个同行业和同职业比较吧。

—你不想当老板？ —想。不过没有钱。

—有钱，你就当老板吗？ —一定。当工人尽管没有风险，但是很难致富。当老板风险很大，既要凭能力，又要有机遇。不过，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赌一把。

注意：工人承认老板风险大，自己没有风险。

否认工人不冒经营风险这一基本事实的马克思能够做到“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

在第五章第一节“劳动过程”中，马克思说到：“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也就是说，这个使用价值是资本家决策的。

经营决策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资本家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创造了价值；反之，若果决策是错误的，他可能破产。

由于以上的错误认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论证能够是“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吗？

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

在第一节“劳动过程”中，马克思说到：“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注意：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仅仅是生产过程，没有提到生产过程之前的经营决策过程

马克思又说：“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

注意：

其一，马克思由于贫穷，所以他妒忌地讽刺富裕的资本家具有狡黠的眼光。实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资本家具有智慧的眼光。他必须看清市场的需求和竞争的风险，才能决定是否进入某一行业。

其二，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投资行为，是采购劳动，是组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动。

马克思又说：“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劳动使用上必要的程度。也就是使工人象为自己劳动那样节约成本。因此，如果工人是由于消极地反抗压迫，而浪费原料，不爱惜劳动工具，那么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的种种针对这一点的节约成本的管理措施并不是在创造什么价值。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

注意：资本家及其管理者不仅仅是监视，更重要的是管理。产品是流程的结果，只有通过流程管理才能够使得产品质量好，价格低，具有竞争力。马克思说什么“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的种种针对这一点的节约成本的管理措施并不是在创造什么价值”，这更是无知之言。资源是有限的，任何节约成本的管理措施，都是在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这本身就是创造价值。为了把资本家排除在创造价值之外，马克思把自己变成了白痴。

在第二节“价值增殖过程”中，由于没有把资本家的劳动算作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价值完全是工人创造的。

马克思说：“既然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物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前文已经说过，马克思仅仅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荒谬之极。

马克思说：“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 10 磅棉花---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纺成纱。---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 12 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 12 先令，等于 2 个工作日的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变为棉纱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区别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纺纱工人有特殊的目的，有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性质，他的产品有特殊的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物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 先令，在 3 先令中体现了 6 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

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 1 个劳动小时内把 1（又） $\frac{2}{3}$ 磅棉花变成 1（又） $\frac{2}{3}$ 磅棉纱，他在 6 小时内就会把 10 磅棉花变成 10 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 6 个劳动小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 3 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 3 先令的价值。现在来看看产品即 10 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 10 磅棉纱中物化着 2（又） $\frac{1}{2}$ 个工作日：2 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 $\frac{1}{2}$ 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 15 先令金额。因此，同 10 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 15 先令，一磅棉纱的价格是 1 先令 6 便士。”

注意：

其一，上文中，马克思将成本当作了价值。生产过程生产出的产品的成本包括物料成本和人力成本，10 磅面纱的成本是 15 先令。而这 10 磅棉纱的价值是由市场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当然，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马克思不是这样看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后的秦晖，你怎样看？

其二，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资本家的投资和劳动，参与车间管理的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不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不是价值的源泉呢？当然，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马克思不是这样看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后的秦晖，你怎样看？

接下来，自以为聪明的马克思开始讥笑资本家：

“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 10 磅棉纱的价格是 15 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 15 先令：10 先令购买棉花，2 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 先令购买劳动力。----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 3 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 3 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变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样谦逊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些新说法。他在选择监工和经理时付出了“劳动”。但这个“劳动”的量又有多少呢？他或许只是方便地让他的小舅子做了经理，而监工还是他小舅子找的。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 6 小时而且是 12 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 10 磅棉花吸收 6 个劳动小时，变为 10 磅棉纱，那末 20 磅棉花就会吸收 12 个劳动小时，变成 20 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 20 磅棉纱中物化着 5 个工作日，其中 4 个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 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 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 30 先令，或 1 镑 10 先令。因此这就是 20 磅棉纱的价格。1 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 1 先令 6 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 27 先令。棉纱的价值是 30 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frac{1}{9}$ 。27 先令变成了 30 先令，带来了 3 先令的剩余价值。”

在嘲讽了资本家提供的生产资料，嘲讽了资本家的劳动之后，马克思计算出是工人超时工作 6 个小时带来了 3 先令的剩余价值。到此为止，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终于被“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出来了。

没有必要再重复，马克思把成本当作了价值，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最为无知的是，马克思这个论证彻底否定了资本家的劳动和作用。

前文笔者已经讲过，在商品生产之前，需要收集信息，分析商品市场容量，分析竞争对手势力，评估投资收益和风险，才决定是否投资该商品；然后是产品设计、流程设计、组织结构设计、人力构成设计和招聘、厂房设计或租赁、设备设计或购买、原材料购买等开工前的组织准备。

正是资本家的劳动启动了经营生产过程，这就是资本家的重要作用。

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投资决策失败，投资将部分甚至全部丧失。资本家需要有抗风险能力，而绝大多数工人是不具备抗风险能力的。正是抗风险能力使得资本家在明知有可能投资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资。

资本家要管理整个经营过程。同样，经营管理也是有风险的，如果管理失误，必将发生亏损。管理是一种组织能力，正是资本家将各种生产条件，从物到人整合起来，才有了企业的整体运作。

资本家的劳动和作用如此重要，怎么能够说价值完全是工人劳动产生的呢？实际上，是资本、管理和劳动合作的结果。投资是要回报的，劳动也要有报酬。资本和劳动怎样分配，则取决于资本与劳动价值评估，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技术问题（笔者也在参与设计模型）。当然，也取决于工人与资本家的博弈。

在处理一次工人罢工时，一位工人对笔者说，如果我们不干活，老板一分钱也挣不着。我对他说，如果老板不开办这家工厂，你上哪里去干活？这位工人说，我可以再去另一家工厂干活。我说，另一家工厂也是老板开的呀！

第二天这位工人对我说，老师你说得对，老板不开工厂，我没有干活的地方。不过，工资确实低了。我怎么办？

我说，我支持你们罢工。你们可以与老板谈判。但是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彻底否定老板，打到老板。

这位工人说，我父亲那一辈人会相信马克思，我们这一代人相信的少了。也许有一天，我能当老板。

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将“企业家才能”定义为生产要素了。

任何一个参与过企业经营管理的人，都不会否认资本家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常识。

只有马克思这种无知之徒才缺少这一起码的常识。《资本论》第一卷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无知，怎能谈的上“数学般精确无疑的论证”？今日还有多少经济学者尤其是企业经营者认为马克思是用“头脑”发现了剩余价值？

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用暴力推行无知。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个无知的论证给世界带来了血腥灾难。

要认证马克思主义是理性权威，马克思的所谓的发现--剩余价值是回避不了的。

剩余价值，秦晖，你为什么只字未提？

二、“知识”与“实践”的欠缺

秦晖的问题，也许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网易财经刊登的《秦晖：受马克思的影响最深》一文中能有所发现。

在这篇网易对秦晖的采访录中，秦晖说：我这里实事求是地要讲，真正的要说，老实说还是马克思对我的影响更深一点。

秦晖至今没有摆脱马克思的影响。青年时，马克思的烙印太深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秦晖的知识结构有欠缺（当然，没有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是完善的。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慎重地介入某些话题。说实话，秦晖不具备评论马克思的知识结构。），并且欠缺经济工作经验，所以被马克思套牢，毫不奇怪。。

笔者这样的判断是否武断？下面我要讲出我的分析，请秦晖反驳。

在这篇网易对秦晖的采访录中，秦晖说：

我觉得，我觉得搞学问无非就是讲两个东西：一个讲事实，一个讲逻辑。---在事实和逻辑上，我觉得是不是经济学家并不重要，只要你讲的是事实，而你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又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这就是可以成立的。

秦晖讲的都是事实吗？并且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都是合乎逻辑的吗？

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的原因，在于每个人的大脑神经网络结构是不同的。

一个孩子三岁时，一千亿个神经元中，每个神经元各自建立了十五万个突触的联结。在后来的大约十年中，他的大脑开始整合它的突触联结网。牢固的联结得以加强，而薄弱的联结逐渐消亡。美国教授哈里·丘甘尼博士把这个筛选的过程比作一个公路体系：“常走的路越走越宽，不走路渐渐荒芜。”---当孩子十几岁时，他的突触联结只有三岁的一半了，已经开辟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联结网络。---它们告诉他对什么信号注意，什么可以不理睬。它们决定他在哪些领域会出类拔萃，在哪些领域会苦苦挣扎。它们制造了他所有的情感和冷漠。

从人的大脑结构来说，你只能看到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无法选择的。

从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来说，你只能识别你能识别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你的知识可以识别的东西。而实践能够扩展视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提高知识结构的质量。实践是走向创新的必由之路。努力地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优化知识结构，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无法从秦晖的大脑结构来评价秦晖能够看到哪些事实，只能从知识结构和实践来评价秦晖，他看到的東西只是事实一部分，依据部分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不合逻辑的。依据秦晖对马克思的评价为例。

“以这样的眼光看，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当然是可以的。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比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准确，而是因为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主义学说一种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只是一个道德理想，对这种理想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却谈不上证伪或证实。而马克思则从‘商品’这个‘细胞’讲起，对资本主义的主要范畴、运行机制、内在矛盾、发展趋势作了一整套逻辑化的推演，并以此证明那种道德理想‘必

然‘要实现。这的确是把社会主义从道德变成了‘科学’（但很难说是‘从空想变成科学’，因为马克思‘想’而落‘空’的事可能并不比莫尔等人少）。”

这段话中有两点要讨论：

其一，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主义学说一种欧几里德式的论证。

以马克思的发现之一剩余价值为例。笔者在前文已经谈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五章中从生产过程来论证其剩余价值的发现的。马克思的论证，其一，逻辑起点错了。商品生产不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起点，市场信息收集与分析是起点。其二，仅仅拿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段来论证剩余价值，论证的定义域不对。

秦晖，微观经济知识欠缺，且没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所以不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如何“讲事实”，如何“讲逻辑”？像马克思一样，秦晖看到仅仅是事实一部分，因此，结论是不合逻辑的

秦晖，你还认为“马克思赋予了社会主义学说一种欧几里德式的论证”吗？

其二，马克思则从“商品”这个“细胞”讲起对资本主义的主要范畴、运行机制、内在矛盾、发展趋势作了一整套逻辑化的推演并以此证明那种道德理想“必然”要实现。这的确是把社会主义从道德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细胞”进行逻辑推演，是肤浅的。他只看见了“物的商品”，没看见“人的能力”。

能力是人自身唯一拥有的资产，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在同样的环境中，个体能力特长是个体生活差异的主要原因，群体能力特色是群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群体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能力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

农业时代，作物种植和家畜圈养活动流程简单，生产周期间隔时间又长，一个农民就能够操作所有的流程，因此，农业生产能力、组织能力简单，生产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基本生活也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农业时代交易活动少，行业种类少，产品品种少，农业社会的能力结构简单。

工业时代，产品经营活动流程复杂，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供货时间短，不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因此，工业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复杂，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西斯只看到了交易费用，没有看到能力结构）。工业时代，新的需求激增，生活方式由自足方式转向交易方式，导致分工。表面上是行业分工，产品分工，实际上是能力分工。能力分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因此，工业时代交易活频繁，行业种类多，产品品种多，工业社会的能力结构复杂。

工业时代，对于企业来说，进入那个行业，经营什么产品才能够盈利，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现代经济学有两条公设：资源有限，能力有别。

根据资源有限和能力差别这两条公设，人生目标设计、企业前景设计以及国家发展方向设计的原则之一是：

必须依据自身的能力和具备的资源去选择自己所做的事情，确立自己的目标。

对于国家来说，必须依据自己的相对优势规划行业结构。对于一个人来说，必须依据自己的才能选择自己所

从事的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企业来说，商品市场容量的存在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则是充分条件。企业必须依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决定要进入的行业，选择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因此，表面上企业提供的是商品，实际上提供的是自身的核心能力。无论是世界贸易，还是国内贸易、地区贸易，表面上是商品交易，实际上是能力交易。

所以，工业时代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商品经济，实质上是能力经济。

如果从“能力视角”来对资本主义的主要范畴、运行机制、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做一套逻辑化的推演，可以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伪科学。

笔者在本文中不想全面驳斥马克思的伪科学，这需要写成一本书。本文仅对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阶级划分、私有制、异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进行批驳。

能力还是生产资料

能力是人获得成功幸福的资源。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是浅薄的。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没有看到资本家的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等一切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叫嚣：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夺取了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没有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无产阶级也是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质量的。我们不会忘记那曾经一无所有的、百十种票证限制供应的贫穷短缺的生活。而所谓的“改革开放”后，又把资产阶级请回来了。

此外，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从来也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工业时代，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能力价值链。科研人员发现、开发新的价值（产品），企业家组织经营新的价值（产品），科研人员 and 企业家处于能力价值链的上端；工人在企业组织之下，生产科研人员研发的新的价值（产品），位于整个能力价值链的下端。因此，科研人员 and 企业家是价值链的主导阶层，工人阶级是辅助阶层。工人阶级怎么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呢？

私有制能够消灭得了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叫嚣：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由“资源有限，能力有别”两条公设，可以得出第一条推论：只有将有限的资源交由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去

经营，企业才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从物的生产资料出发，看到的是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差距；从人的能力出发，看到的则是资源的效率和价值的创造。只要资源不是无限的，能力不是一样的，私有制是永远存在的。暴力消灭不了私有制，当今的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4月8日，此文写到这里时，收到一个噩耗，撒切尔夫人离世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批判马克思主义。有人欢迎，有人抵制。抵制的人用福利国家来说事。是撒切尔夫人的一句话，为我提供了反驳的有力依据。撒切尔夫人谈到“福利国家”制度时说：社会有一个梯子和一张安全网，梯子是用来提供人们自己努力改善生活的，安全网则是用来防止人们跌入深渊。

福利国家建立安全网是对的，福利国家砍断了梯子则是错误的。“私有制”是一把能力等级梯子。这把梯子是为具有才能并努力拼搏向上的人提供财富和名誉的一种机制。一个国家是否是健康，根本上要看能否为有能力的人提供机会；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根本上要看能否不断涌现出更多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人。人类社会绝不能砍断私有制这把梯子，要保护努力进取的人，要提高人类的能力水准。

正是私有制激励人们不断地为自己创造财富，并通过“看不见的手”而惠及到他人。至于私有制带来的贫富不均，可以通过税收和慈善制度来适度调节。

无能与异化

由于工业生产必须以企业为单位。从“能力视角”，任何一个企业必须在企业中建立设计能力、销售能力、计划能力，质量保证能力以及生产能力的结构。资本家必须具备抗风险能力、信息收集分析能力以及资本筹措等能力，设计人员要具备设计能力，销售人员要具备销售能力，计划人员要具备计划能力，质量人员要具备质量保证能力，工人要具备生产能力，正是这些能力的组合作用达成了产品的盈利。企业员工在企业里提供的是各自的能力，根据能力贡献获得相应的报酬。如果员工觉得报酬低，既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变换现有的低报酬岗位，或者提升自己的职位，也可以申诉，可以离开，甚至可以罢工。

“马克思认为，这一时期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已经发展得走向了反面。即产生了‘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也就‘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他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秦晖《自由、乌托邦与强制》）

从生产资料的视角出发，企业似乎是占有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没有资料的工人组成；从能力视角出发，是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构成。人们依据自己的能力自由地结合，怎么能说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而是能力的分工与合作，哪来的异化？员工可以离开，也可以罢工，如何是“自由地”失去了自由。

工业时代，从能力视角，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是能力交换，财富分配方式以能力代替了暴力。由于交易的存在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自身的能力范围，同时为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人提供了获得财富和名誉的机会。私有制是一种激励机制，正是私有制为那些努力进取的人提供了自由个性发展的条件。而那些像马克思一样的无能之辈则沦为下层贫民，这厮以至于向拉萨尔乞讨而后又反目。站在私有制这把梯子下端的马克思妒忌地看着梯子上端的人，仇恨地叫嚷着，异化了，异化了！他妄图毁掉这把梯子。

马克思之所以异化成了一个恶意侵犯者，原因是他的无能。无能的人不仅生活贫穷，而且往往从利己的视角恶意他人剥削，攻击他人剥夺了他的自由。无能异化了马克思，他就要用暴力来剥夺他人的资产了。

实在没有办法为马克思遮羞了，有的人拿出“异化”来说事，看不出马克思“异化”背后的无能和龌龊。马克思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后继者一点长进都没有，还在被马克思编制的这条“异化”的小绳牵引着！

计划经济是一种人力资源破坏机制

十几年前，一次与徐友渔见面。当他得知我正在研究信息经济学，从事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后，对我说，有人认为，凭借信息化，计划经济可以实现。

我回答，这是错误的认识。

其一，计划经济是由国家主导的。国家主导经济是错误的。

其二，计划经济是一种人力资源破坏机制。

上文提及的第一推论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源问题，即如何判断谁具备企业经营管理能力？这是一个如何获取经营管理者能力的信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经营管理者能力差别信息的。

市场竞争是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市场竞争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市场，提供产品服务。产品服务在经营管理者之间展开竞争，提供质量好价格低廉的产品服务的经营者将获得竞争的胜利，继续掌握一定的资源，而失败者将退出市场，丧失对资源的处置权力。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

我们再来看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废除了市场竞争，资源配置属于组织权力。如果民主国家施行计划经济，经营管理者配置过程的试错费用是由纳税人负担的，不是由经营者负担的，这对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施行计划经济的专制国家，经营管理者选择在他们自己内部人中间进行，只有内部人具有资源的处置权力。近十几年，中国流行一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辛辣的广为流传的民间话语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经营者垄断问题。资源不对所有公民开放，剥夺了相当多的人合法利用资源的权力，大大缩小了经营管理者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选择范围，破坏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能力视角”，市场经济是能力激励和选择机制，计划经济则是能力破坏机制。

秦晖，你缺乏某些经济学常识，又缺乏经济工作经验，关于“商品”，同马克思一样，你只看到了物的表面，没有看到能力内涵，所以你至今没有从马克思的无知中走出来。

现代经济学作为成果从西方引进到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后，又在快速地发展，如果你不与实践，你只能永远当学生。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实践性学科，这个世界不存在“超经济学家”。

以上是我与秦晖的讨论，有些年轻人很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下是简单介绍。

三、我们在做什么

1971年，毛泽东向世界打开他的书房后，我们意识到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我曾对朋友们说：“文人鞋和线装书是不可能领导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我们必须铲除中国产生毛泽东的专制土壤。”至于如何铲除，当时并不清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逐渐知晓了如何在中国铲除专制土壤。批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时做的主要事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我们在做两件事情：

其一，协助企业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提高企业管理效率，获取更多的收益，从而使企业家握有与员工分享的利润。其二，协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员工家庭幸福。

协助企业建立信息管理平台

比尔·盖茨《在数字神经系统》一书中谈到：“你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决定了输赢”。经济运行是一种矢量，需求信息提供需求方向和数量，是经济运行的决策依据。不同区域、人群、个人的需求内容和数量是不同的，掌握的需求信息越准确，企业库存和社会库存就越低，资源就会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应用。同时，经营管理者能力优势信息越准确，资源配置能力就越强，资源利用效率就越高。

我们协助企业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支持经营活动。企业利用网络快速搜索信息，降低信息搜索时间和成本。企业利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和商业智能系统

（BI business intelligence）收集顾客信息，挖掘顾客期望，预测顾客期望的新趋势，制订销售预测计划；利用企业计划与预算管理系统（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EPB）、核心竞争力管理系统（Core Competency management, CCM）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整合企业的资金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利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提高生产速度，减少生产周期，降低库存；利用供应链管理系统（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使企业与顾客、供应商之间共享产品或服务信息，保证在顾客在需要的时间、地点生产和交付产品，提高产品服务供应链的业务交易效率。

CRM和BI提高企业需求信息的预测能力，实现将经营活动的资源配置信息置前，缩小了需求预测和实际需求的差异。ERP和SCM使得企业经营流程缩短，提高了经营快速和反应能力，减少了时滞。

信息管理能力决定企业经营的命运。信息系统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预测、监控，使得经营活动看得见，降低经营失控的风险，提高了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

同时，我们协助企业建立胜任能力模型，实施人才测评，使得企业获取经营管理者能力优势信息。

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信息技术，这为人们所熟知。二十世纪，另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则是人才测评技术，这大多为人力资源学者和工作者的所知晓。

从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脑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管理科学正在积极探索识别人类个体能力优势信息的方法,建立关于人类个体的能力优势的知识系统。

人的能力优势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某种工作的“胜任能力”。“胜任能力”是能够区分工作绩效水平的个性能力。

我们用冰山模型来说明“胜任能力”的特点,“胜任能力”这座“冰山”是由“知识、技能”等水面以上的“应知、应会”部分,和水面以下的“态度价值观、自我形象、个性、内驱力”等情感智力部分构成的。

人的胜任能力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和经验,还包括信息收集和分析、人际理解、客户服务、组织承诺、沟通协调、团队领导、培养他人、自信、成就导向、冲击与影响、关系建立、主动性、团队合作、秩序与品质、组织认知、自我控制、监控、弹性等能力。

工业时代,尤其是信息时代,人类扩大了自身能力的边界之后,发明了一系列测试技术识别每个人的胜任能力,例如智力测评技术、情商测评技术、评鉴中心技术。

目前有效性最高的是评鉴中心技术。通过公文筐(测评对象模拟处理日常工作中的邮件,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案例分析(测评对象在一个经过结构化设计的实战案例中,根据要求完成多项任务,展现自己的分析、解决问题等能力)、演讲(测评对象口头表述案例分析的结果。口述中,测评师不断质疑测评对象的观点,测评对象则通过表述和捍卫自己观点,进一步展现自己的说服感召能力)、角色扮演(模拟管理情境中常见的上下级对话,测评对象表现自己培养下属、说服感召、人际理解等方面的能力)、模拟工作会议(模拟实际的工作会议,自由讨论、解决会议要求解决的工作任务,测评对象表现自己的决策能力、说服感召、市场意识等)等测评,对测评对象的行为表现进行分析,就能够识别他们的胜任能力构成。

根据经营管理人员胜任能力模型对希望成为经营管理者 and 现有的经营管理者进行测评,依据测评结果,对经营管理者进行初选和培训,就能够减少市场竞争对经营管理者选择的时间和费用,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资源浪费。

正是由于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使得企业提高了运营效率,增加了收益,于是,企业家有能力拿出更多的利润与员工分享。

今日,一个人如果不懂信息管理,不懂人力资源管理,还有什么资格研究经济呢?

协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曾经有一位上海企业家问我,公司上市有什么好处?

我回答,可以从多个视角回答你的问题。我首先要问你的是,你想当皇帝还是当总统?

他愕然地反问,这与当皇帝或总统有什么关系?

我说,如果你要当皇帝,就不要上市。你可以继续独揽大权,独享利润,独断独行,你就是法律。而要上市,你就要当总统,你必须分权、分利、理性决策,认同流程就是法律。

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天后回答你。

三天后，他对我说，他要当总统。

我问，为什么？

他回答：如果公司不发展，还是这么大的规模，我可以继续当皇帝。如果公司要发展，必须扩大规模，开拓其他省市的市场，我需要成立分公司。为此我必须分权、分利、理性决策和遵守流程制度。

他很高兴，是因为他想通了。

我很高兴，是因为又一个现代企业家诞生了。

从皇帝到总统，标志着一个人进步成了现代人；从皇帝到总统，标志着一个企业成长为现代企业；从皇帝到总统标志着，一个国家成功转型为现代国家。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么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杨伊文《一个幽灵仍在大陆游荡》）

毛泽东将中国拖进了文革深渊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现代国家的知识贫乏，加以马克思、斯大林的影响，使他不能从皇帝走向总统，最终戴着一个现代秦始皇的帽子撒手人间。

近十年，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企业转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家面前，我们讲企业家责任；在工人面前，我们批判马克思的剥削论。协助企业家从皇帝成长为总统，使得员工从雇工变成公民。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分权、分利、理性决策和遵守流程制度。

分权是企业依据流程责任链定义各级经营管理人员的决策权，建立《管理权限表》；

分利是企业依据员工经营贡献实施利润分红及股权激励，建立《利润分享制度》和《股权激励制度》；

理性决策是企业经营管理层依据市场容量信息、竞争对手信息和自身核心能力制定战略规划，建立《企业战略管理制度》；

遵守流程制度是企业依据 ISO9000 管理体系建立《流程制度》，各级管理人员必须遵守流程制度。对于企业，流程就是法律。

近十年来，笔者非常高兴的是，在中国，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越来越多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在权力分享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了“一把手、一支笔”的个人决策模式，将决策、管理、业务权力分散到具体的部门之中，使得责任和权力相匹配。

在分享利益方面，有的企业家意识到，如果工人拿不到合理的报酬，最终总将无人买他们的产品。有的企业家认为，不分利的企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还有的企业家说，企业小的时候，企业是个人的；企业大了就是大家的，最终是社会的。一些企业已经建立利润分享制度以及股份分享制度。

在理性决策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了“拍脑袋”、“摸着石头过河”决策方式，依据市场信息，进行概率分析，降低决策风险。

有一次，笔者在一家大型国营企业讲课。我指出，信息时代的工作原则是：信息流程大于工作流程。“摸着石头过河”是极端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你一个人“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淹死的是你一个人，你怎么能强制 13 亿人跟着你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呢？对于企业来说，没有建立信息结构，不会数据分析，总是“大概、可能、也许”，“走到哪儿算哪儿”，怎么会健康发展呢？课后，一位企业高管对我说，老师，胆子不小，知不知道是谁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知不知道你在批评谁？我回答，当然知道。关键是我讲得是否正确。这位高管回答，当然正确，国家不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企业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遵守流程制度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严肃流程纪律，特别是管理人员的流程纪律。上海嘉定一家公司，悬挂着“流程大于董事长”的标牌，依法治厂。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为什么流产，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工业企业，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拥有丰厚的封建专制土壤；1949 年，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逞，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足够的现代企业，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依然深厚。今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清除产生封建专制的土壤。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分权、分利、理性决策和遵守流程制度的企业小环境中成长为现代人之后，他们就必然要求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我们很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必须脚踏实地去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宏大叙事。“今天的中国不缺理念，缺的是实践。今天中国不缺对不合理制度的愤怒，缺的是建立合理制度的探索。不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缺的是民主的训练和法治的实施。作为最具有契约意识和实践的企业家阶层有责任在社会转型的重大关口一寸一寸地铺设一条理性和规则的大路。”（王维嘉：《企业家精神与主体意识》）

我们为民主中国的到来已经工作了几十年，我们相信，未来十几年中，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和员工在建成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之后，能积极参与到国家立法立规的过程中来，中国将会转型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朋友们大都认为秦晖是在献媚，我却有所疑惑。秦晖对中国时政的批评是有一定深度的。

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这血腥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是苟延残喘。

人类的新时代—信息时代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年轻人不要像父辈那样纠缠于过去，把精力用于新生活吧！

来源：[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